

克氏互文性理论的演变：建构与变异

三明学院 丁礼明

摘要：自从法国哲学家克里斯蒂娃1966年首创术语“互文性”以来，这一术语已成为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关键词之一，一直为多种理论流派所引鉴。本文旨在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走向作整体勾勒，重点考察这一术语历史沿革中的建构和变异。由此，一方面揭示西方学术界对这个术语的基本理解，另一方面凸现这一重要术语在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互文性；文本理论；结构主义；否定互文性

作者简介：丁礼明，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及理论，电子信箱：yonghuadeng@163.com

1 引言

互文性(文本间性)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这一理论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是与20世纪欧洲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等紧密相关。围绕它的阐释与批评大多出自法国思想家和哲学家，尤其以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罗兰·巴特、雅克·德里达、杰拉尔德·热奈特和迈克尔·瑞法特为代表。国内互文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全面介绍互文发展脉络的并不多见。本文旨在对西方互文性理论的历史背景和基本走向作整体勾勒，重点考察这一术语历史沿革中的建构和变异。

2 互文性理论的诞生：克里斯蒂娃与巴赫金

互文性以质疑原创性和作者权威为出发点，但其本身的出处却毫无争议：

互文性是法国后结构主义代表人物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的重要概念。克里斯蒂娃认为，一个文学文本相当于一个能指、一个词，它是对某个所指、某个对象的表达。她首先从语词之间的反射与交织看到了文学文本之间的反射与交织：“文字词语之概念，不是一个固定的点，不具有一成不变的意义，而是文本空间的交汇，是若干文字的对话，即作家的、受述者的或人物的，现在或先前的文化语境中诸多文本的对话”（Kristeva, 1986: 36）。克里斯蒂娃在《受限的文本》一文中给文本与互文本下了一个更明确的定义：文本是一种超语言学机器。在此，她瞄准的是交际话语与此前及同时的各种话语所发生的关系，并以此而重新分配语言秩序。因此，文本是一种生产力。这意味着：首先，文本与其所处的语言关系是一种（破坏—建立型的）再分配关系，人们可以更好地通过逻辑类型而非语言手段来解读文本；其次，文本是众多文本的排列和置换，具有一种互文性：在一部文本的空间里，取自其他文本的陈述文相互交汇与中和。（王瑾，2005: 35）这几种定义逐层推进，其中第二种定义最为理论界所熟悉，它出现在《巴赫金：词语、对话和小说》一文中，克里斯蒂娃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互文性理论。随后，克里斯蒂娃一方面向西方理论界介绍了巴赫金其人，另一方面，又将巴赫金的思想加以阐发。

克里斯蒂娃把文本分为“生成文本”和“现象文本”两个层面。“生成文本”植根于与主体潜意识紧密相联的“内驱能量”，讲话主体使原先由他人的价值观念和愿望构成的语言组织产生错位并得到修正。“现象文本”是文本呈现在具体语句结构中的文字现象，属于文本的主题层面，它展现的是可阐释的结构，传达的是独白的和统一的主体声音。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强调：互文性革命发生于“生成文本”和“现象文本”之间交流的“零度时刻”（陈永国，2003: 79）。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父亲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克里斯蒂娃将政治性的主体引入互文理论，她旨在说明，“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陈永国，2003: 79）。由此，克里斯蒂娃将政治主体引入了互文性理论。克里斯蒂娃对文本及互文性问题进行阐释的《符号学：批判的科学和/或科学的批判》《文本的结构化问题》等文章被《整体理论》文集收入，同时收入的还有福柯、德里达、巴特、索莱尔斯、克里斯蒂娃等人撰写的论文。这些文章从哲学、文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出发共同走向了对“结构”“符号”“意

义”“主体”等神学范畴的彻底质疑。克里斯蒂娃“互文性”概念的提出与这种超越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的努力密不可分,在这种理论背景中,“互文性”与“书写”“生产”等概念相结合,成为一种批判武器,并直接支持了巴特同时期提出的“作者死亡”论。

提及互文性,巴赫金将是一个无法绕开的人物。克里斯蒂娃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尤其是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理论的影响。巴赫金没有使用过“互文性”或“文本间性”的概念,但他在实际研究中却一直在使用互文性理论。克里斯蒂娃最感兴趣的是巴赫金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对话性”是巴赫金学术思想的核心和哲学基础。“他以各种形式提出自我与他人的关系问题”并“为同一组问题追寻不同的答案。”(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2000:88)在巴赫金看来,文本是人文学科和人文思维的“第一性实体”,它既是对此前文本的应答,又要求后续文本对它作出应答。意义永远是两个以上意识的活动,因此,文本总是对话性的,总是指向其他文本。同时,巴赫金把文学(文本)与文化关系放置在其理论基点上,无论是在论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还是在挖掘拉伯雷创作中的狂欢文化,巴赫金一直注重阐释文学文本的文化意义。巴赫金认为:“不应该把文学与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该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联系起来。这些因素作用于文化,只有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巴赫金,1998:403)为了解释互文性的合理性,巴赫金提出了“长远时间”理论。他认为真正伟大的作品都是经过若干世纪的文化的酝酿才造成的。如果只是从近期实利出发,那么就不会洞悉现象的深层含义。“长远时间”以文本的历时性打破文本共时性观念,为互文性理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事实上,无论是克里斯蒂娃还是巴赫金,都在文本互文理论的创造上贡献巨大。克里斯蒂娃从女性角度细致地阐释了互文和互文性理论的方方面面,可谓全面和充分地诠释了互文和互文性;而巴赫金则从其他方面,不仅补充和升华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而且在对话理论上以及挖掘狂欢文化的文化意义方面拓展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理论。纵观国内文学界,我们发现,很多学者借助两位大师的理论开展了大量文学文本互文研究工作,发表的论文和专著涵盖文学、翻译学和语言学等各个领域。罗选民的《互文性与翻译》(2006)、秦海鹰的《互文性理论的缘起与流变》(外国文学研究,2004)、黄念然《当代西方文论中的互文性理论》(外国文学研究,1999)以及杨金才《〈漫漫回家路〉的互文解读》(外语与外语教学,2007)都给国内文学界互文研究

树立了典范。

3 罗兰·巴特对互文性理论的贡献

互文性理论作为先锋派文论家手中的一个批判武器，在当时法国的整体语境中互文性属于一种边缘话语，加上克里斯蒂娃的思想体系庞杂，其著述从语言到思想都极为艰涩，其中既有转换生成语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精神分析等学科术语，又有数学公式和拓扑学术语，所以这个理论影响起初基本上只限于“如是派”小集团及其外围成员，相当多的文学教授则坦言“不好懂”。互文性能从她艰涩的著述中脱颖而出，在批评界广泛传播并迅速发生流变，很大程度上，还是要归功于罗兰·巴特。

克里斯蒂娃（以博士研究生身份）1966年在巴特的研讨班上第一次提出互文性，此后巴特便成为这个概念的热情宣传者和积极阐释者。《文本理论》是罗兰·巴特1973年为法国《通用大百科全书》撰写的新词条。在这条精心撰写的词条中，巴特介绍了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和在这一概念上形成的文本理论：“文本与作品不应互相混淆。我们全部能说的只是某部作品中有（或者没有）文本。”“作品可以握在手中，而文本存在于语言中”的巴特，当时在法国知识界已经确立了显赫声望，他的赏识无疑为“异邦之女”克里斯蒂娃的新理论传播打开了便捷之门，但是，另一方面，巴特在介绍和阐释克里斯蒂娃互文性理论的同时也将这一理论发展到了极致。在1968年发表的《作者的死亡》一文里，巴特用充分的证据来论证“作者死亡”的观点。首先，从语言学上来讲，作者从来就不过是一个写作的人，语言陈述的过程可以在不需要主体来充实的情况下良好地自行运转。即本文中发言的不是作者，而是言语活动本身。作者在写作中的重要位置就被言语活动本身消解了。实际上，在此之前，法国象征主义大师马拉美最先尝试动摇作者地位。马拉美诗学的目标就是崇尚写作而取消作者，他认为在文学写作中，只有言语在“出色”地表现，而没有作者“自我”的存在。法国小说家普鲁斯特在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中也颠倒了作者与叙述者的关系。他们无疑都是巴特理论的有力的先驱者和同盟军。其次，在现代写作观念中作者主体性的丧失也导致了作者的死亡。传统的写作观念中，作品是作者的产物，是作者思想和身体的延伸，作者与作品的关系犹如父与子的关系。而与之相对的观点，现代写作中，没有了作者，只有当下的“抄写者”，写作与文本是同时出现的，这样就没有了作者预设的思想和观念。巴特颠覆了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权威身

份和霸主地位,并宣布了“作者的死亡”。《S/Z》(1970)则是巴特对互文性理论的精彩展示。在这本书中他把文本界定为“跨学科的”和“多主体性的”,他对读者而不是文本予以更多的关注,他注重读者参与文本的“表意实践”。巴特把文本分为两类:“可读的”和“可写的”。“可读的”文本是一类可以进行有限的多种解释的文本,是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进行阅读的,是半封闭性的;“可写的”文本则不能按照明确的规则和模式来阅读,已有的解码策略不适于这类文本,“可写的”文本是以无限多的方式进行表意的文本,是开放性的文本。“可写的”文本解放了读者。与克里斯蒂娃不同,巴特本人并不热衷于“超语言学机器”“现象文本”“生成文本”等抽象术语,他的互文性思想中融入文本享乐主义。依巴特之见,可读文本是快乐文本,可写的文本是极乐文本。可读文本符合读者的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从能指到所指是平坦透明的线性过程,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消费文本的快乐;“极乐”在法语中的本意是性高潮来临时的快感,在此指文本的能指与所指断裂后,由文本狂欢式的能指游戏所产生的夹杂着痛创的极度快感。互文性文本则与读者的文化传统和阅读习惯相悖,整个阅读过程障碍重重、险象环生,但是读者分明可以体验到一种狂热的、破坏性的、夹杂着痛感的极乐。

巴特对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在于延伸了文本研究的视野。克里斯蒂娃认为文本没有生命力,她只是在表面上探索了文本的现象——现象文本和生成文本,而在巴特眼里文本被赋予活力。他认为,文本不仅可读,而且可写。可读文本是快乐文本,可写文本是极乐文本。此外,巴特颠覆了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权威身份和霸主地位,并宣布了“作者的死亡”。当作者消失以后,文本的源头就失去了依据和出处,也就不再有权威的和唯一终极的意义解释。文本成为一个多维的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多种写作相互结合,相互争执,写作从创作的神圣性变成了抄写的滑稽性,写作所依赖的不是作者而是可供自由选用的词汇的海洋,“生活从来就只是抄袭书本,而书本本身也仅仅是一种符号编织物、是一种迷惘而又无限远隔的模仿。”(王玉括,2005:42)在这样的写作活动中,文学“独创性”显然不可能存在,它被永无止境的“互文性”所取代。国内学者对巴特互文理论的关注大多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他的符号学美学、解构主义文学批评思想以及神话思想是国内研究关注的重点。刘文的《辩证性和革命性:克里斯蒂娃和巴特的互文本理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是国内为数不多的比较研究。

4 布鲁姆在互文性理论方面的新见解

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解构主义批评家布鲁姆精心营构了一套关于诗歌影响和误读的实用批评理论。布鲁姆指出：“诗的影响当涉及两位强大的、真正的诗人时总是通过对前一位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纠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的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无以存在。”（胡宝平，1999：21）布鲁姆深受尼采“权力意志”说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影响，这使他突破了形式主义的樊笼而独辟蹊径，从心理角度透视诗歌影响和诗歌生成，建构出自己独特的互文性理论话语体系。正如索绪尔切断了语言符号与实际指涉的联系一样，布鲁姆也切断了作品跟外在世界、历史以及作家自传等的联系，而将视点放归处于互动与关联网络中的文本，把文本的生成置于后起作者与其前驱的对抗关系而非单一的继承关系中去观照。对布鲁姆而言，任何诗歌都是对其亲本的误释，因而是“三位一体”的：它自身作为一个文本存在，其中设定了一个亲本存在以及不可避免的解读环节，且解读有着双重所指：既是行为，又是结果。在《诗歌与压抑》中他说：“诗歌不过是一些词，这些词指涉其他一些词，这其他的词又指涉另外一些词，如此类推，直至文学语言那个无比稠密的世界。任何一首诗都是与其他诗歌互文的……诗歌不是创作，而是再创作。就算强势诗是一个新的开端，亦只是再次开始。”（Bloom，1973：58）他一再强调，一首诗的产生是与另一首前驱诗息息相关的，一首诗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首诗，因此用克里斯蒂娃的话来说就是“从一首诗的所指可以推及更多所指，以至于从某个诗歌话语中可读到无数其他的话语。”（Kristeva，1969：225）这种地道的互文式构想无疑否定了文本自足自律的观点，促使我们力图去探求每个诗歌话语后面的话语。

不过相对于包括克里斯蒂娃、巴特在内的法国理论家来说，布鲁姆对互文性的运用有了很大胆的推进，他赋予互文性独特的动态意义。在他之前，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视互文关系为静态的、悄无声息的吸收和转化，甚至是匿名的引用（王瑾，2005：72）。布鲁姆则正好相反，他的互文意味着卓越的诗人在与其前驱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在他看来，一个诗歌文本“并非一个书面符号的集合体”，而是一个“心理战场，于其中真正的力量为不被湮灭这唯一值得一搏的胜利而斗争”（Bloom，1980：2）。前驱诗歌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其“文本霸

权”，这种霸权的性质相当于马克思主义所说的“社会霸权”或弗洛伊德所说的“心理霸权”；一切文本权力都伴随着一个强迫行为，一个所有权宣言（Bloom, 1980: 6）。互文性在布鲁姆诗论中表现为紧张的对峙、敌视和斗争关系，文本也不再是静态语言符号的聚合体，而成了充满愤怒和喧嚣的战场。在这点上，布鲁姆无疑是对克里斯蒂娃的一个很有意义的超越。更重要的是，布鲁姆将互文性问题推及文学史，其意义也不同寻常。首先，他再次证明文学发展和文学史演进是动态的而非平静的，其中充满了冲突和斗争。其次，文本并不是在独自跳舞，并不是德里达所说的自由游戏。

“诗学误读”的背景是“现代”文学，布鲁姆提出的影响、焦虑和误读是这一时期的文学主题，这有一个重要前提：作者们对于新颖性、独创性的孜孜以求，其本质则是西方文化中个体主义和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诗学误读”将作者的自我意识抬到了一个绝对的高度，从而为“影响—焦虑—误读”的三阶段模式找到了立足点。布鲁姆借鉴了弗洛伊德对家庭罗曼史、焦虑的阐释，尤其是他的人格结构模式，但对它作了修正。在布鲁姆的诗人人格结构中，本我是前驱作者，自我是诗人自身，超我则是死亡。影响不可避免，受人影响就意味着取人之有为己所用，但也会有负债之焦虑，有我不如人的焦虑，如此影响因而成了“摧残性力量”，成了“灾难而不是福音”；而对影响的“焦虑是非常可怕的，因为它是一种分离的焦虑，同时又是一种强制式神经官能症的开始。这种神经官能症也可以称为对人格化的超我——死亡的恐惧。”（Bloom, 1973: 58）一面是前人的光环，一面是死亡的威胁，且二者成正比存在，后起者要成为真正的诗人就必须抗争前人。如上所述，文本之中有作者的主体意识，有作者的焦虑，还有作者的权力意志和冲创意志；互文关系并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关系，还有作者的功能内化在当中。最后，布鲁姆也提醒我们在文学研究中，不要将注意力仅仅放在业已形成的以结果态存在的文本，而要放到文本形成的动态过程中，去寻求文本生成的内在机制。

与前辈相似的是布鲁姆也切断了文本跟外在世界、历史以及作家自传等的联系，而将视点放归处于互动与关联网中的文本，把文本的生成置于后起作者与其前驱的对抗关系而非单一的继承关系中去观照。从这个意义上看，他推动了文本互文理论的前行和发展。另一方面，他把互文理论运用在诗歌领域，他认为，一首诗的产生是与另一首前驱诗息息相关的，一首诗的意义总是指向另一首诗，由此拓展了文学互文研究的外延。不过相对于包括克里斯蒂娃、巴特在内的法国理论家来说，布鲁姆对互文性的运用推进最大的在于，他赋予互文性独特的

动态意义。在他之前，克里斯蒂娃、巴特等人都视互文关系为静态的、悄无声息的吸收和转化，甚至是匿名的引用。布鲁姆则正好相反，他的互文意味着卓越的诗人在与其前驱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国内布鲁姆研究集中在诗学误读理论和浪漫主义诗歌阅读理论研究上。学者王宁和张龙海对布鲁姆理论在国内学界的推动和普及功不可没。张跃军解读了布鲁姆的浪漫主义诗歌理论与新批评和弗洛伊德理论的关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研究布鲁姆互文理论的论文发表数占全部研究论文总数的20%，黄念然断定布鲁姆的互文理论在本质上有别于他的前辈，李玉平和王丽莉等学者甚至形成研究群体借助布鲁姆互文理论撰文解读西方文学文本。但是，研究成果基本上是依照他的互文理论阐释文学文本的常见现象，而大胆提出独到见解批判性地分析布鲁姆互文理论不足的学者少之又少。

5 另类互文性理论的建构

互文性概念在巴特的《文本理论》一文中获得正统地位以后，越来越受到文论界的青睐。各种背景的理论家们纷纷接过这个概念，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对它进行调整、修正和再阐释。从总体上看，大致沿着以下两条路径变化：以热拉尔·热奈特、米切尔·里法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路径，以及以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解构主义路径。

5.1 热奈特结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建构

由克里斯蒂娃发明、经罗兰·巴特阐释的互文性只是互文性理论发展的一个方向，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如是派”以外的法国学者也接受这个术语，他们努力摆脱或剥离这个术语最初携带的批判意图或论战色彩，以平静的学术心态审视这个概念的内涵。热奈特在《广义文本之导论》一书中指出：“诗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文本，而是广义文本。”热奈特进一步解释：“广义文本无处不在，存在于文本之上、之下、周围，文本只有从这里或那里把自己的经纬与广义文本的网络联系在一起，才能编织它。”（艾略特，1989：2）在《隐迹稿本：第二度的文学》一书中，热奈特又提出了“跨文本性”的概念，他认为，从根本上讲，文学是跨文本的，或者说是一种产生于其他文本片断的“二度”结构。同时，热奈特提出了跨文本的五个主要类型：1) 互文性，这一类包括了引语、典故及抄袭。2) 准文本，指一部作品的序、跋、插图、及护封上的文字。3) 元文本性，指与“评

论”的关系,这种评论把一个文本与此文本所谈论的另一个文本联系起来。例如,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默不作声地批评了《拉摩的侄儿》,这是一种元文本性。4)超文本性,指把文本B——热奈特所称的“超文本”——同一个前文本A——热奈特称之为“前文本”——联系起来的任何关系,文本B在文本A的基础上进行了“嫁接”,其“嫁接”的方式与评论方式迥然不同。例如,劳特莱蒙的《诗》对巴斯格、拉·罗什富科等作品的改写。5)广义文本性,为了充分理解一个文本及其互文本,读者需要了解组成文学领域的种种类型的等级体系,广义文本性包括言语类型、文学体裁、叙事模式等。这是一种秘而不宣的关系,至多由副文本提示一下(例如《抒情诗集》等,或标示在封面上的小说、诗歌等字眼)。热奈特分析的这五种跨文本类型,它们之间并非封闭、没有交流,而是相互交叉、互相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热奈特互文性理论重申作者意图的重要性,追寻文本的确定意义,注重文本解读的实用性等特点。

5.2 德里达解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建构

年轻的德里达1966年在美国霍普金斯大学举行的人文科学讨论会上发表《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与游戏》一文,这篇文章被誉为解构主义的宣言书,德里达由此在国际论坛上确立了自己的独特形象,访学于美国的霍普金斯大学和耶鲁大学,并与耶鲁四人帮,即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哈罗德·布鲁姆和杰弗里·哈特曼一起组成了风靡一时的“耶鲁学派”。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认为:“文本不再是一个业已完成的写作集子,不是一本书里或书边空白之间存在的内容,它是一种差异化的网状结构,是由各种印迹织成的织品,这织品不停地指出其身外的东西,指出其他差异化的印迹。”(Derrida, 1979: 83)因此,一切话语都具有互文性。此外,人们对于文本的所有批评、欣赏与阐释,都只不过是对于前文本的尝试性增补,每一次增补,又必然受到前文本和其他相关文本的污染,必然携带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踪迹。因此,于单个文本的形式分析,永远不足以描写文本的意指过程。用德里达的话说,每一特定语境的突破,都以绝对不可限制的方式,繁衍出无数新的语境。

互文性理论在后来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的批评理论中发展地更为成熟,并被广泛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保罗·德曼认为,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应该建立在对文本的修辞性阅读上,此时,读者面对的将是一部文本机器:“那里有一个机器,一个文本机器。”“机器”一词旨在强调文本中因修辞而造成的语言转义的自动性。语言符号的这一特点使文学处于自我解构状态中,也使得文

学文本因语言所具有的修辞性而呈现出互文性特征。德曼认为,不仅文学文本依靠语言的转义发生作用,文学批评文本乃至历史文本、政治文本、哲学文本都是如此。这样,德曼从语言修辞角度彻底取消了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界限,将一切文本都归入到互文性中。希利斯·米勒将德里达的“延异”理论与德曼的修辞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解构主义修辞批评的方法,并将这种方法扩展到互文性理论的研究中,尤其是用于小说理论的研究中,在《小说与重复》一书中,米勒通过分析哈代的生平在《意中人》中的反映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任何小说都是重复和重复之中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或者是以链状形式与其他重复相连的重复的一个复杂系列。”(Miller, 1982: 3)新的文本既寄生于老的文本中,又通过吸食而将它们破坏,这种寄生兼寄主的关系存在于一切文本中而使文本具有自我瓦解的性质,文本仅仅存在于互文性中并且构成历史延续链条中的一环。

5.3 摩根否定互文性理论的建构

当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又有不同的文学批评家对它进行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伊斯·摩根(Thais E. Morgan)就是其中的代表。在《维多利亚的理论:从德里达到布朗宁》中,摩根不仅鲜明地质疑文学与理论之间的关系,而且希望通过文本阅读试验而不是按照惯例套用某种批评方法去审视文本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摩根在他的文学评论《互文的空间》里根据作者在创作中出于不同目的有意和无意地借用他人文本的做法提出文本之间的互文三法^①: 1)关于肯定互文性,摩根认为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在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里对《圣经》叙事结构的借用,以及麦尔维尔在《白鲸》中借用《圣经》中人物的名字的做法,都应该归属于肯定互文的范畴。因为在小说文本中属于正面借用他人文本的行为,理应给予肯定和赞赏。另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圣经》典故和《圣经》人物在西方人的认识上被看成是神圣的和不可侵犯的。凡是引用《圣经》作为文本中一部分的,都是对《圣经》所传达出的宗教信仰的弘扬和尊重。2)否定互文性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在摩根看来英国作家亨利·菲尔丁在小说《约瑟夫·安德鲁斯》中借用理查森在《帕梅拉》中的文学主题,并加以发挥,以此批判和讽刺主人公道德上的虚伪的做法属于否定互文性,而不是肯定互文性。3)至于内在互文性关系,摩根认为这种做法旨在强调同一作家前后作品所存在的相互联系,即同一位作家在他的系列小说里内在相关地使用同样的意象,去表达一种深刻的文学主题。劳伦斯

小说与诗歌中频繁出现的“彩虹”表达出的是作家对美好两性关系的企盼；艾丽斯·沃克作品中惯常出现的“百纳被”意象，不仅在表面上被看作黑人的传统文化的典型符号，而且表明作者希望黑人在白人主流社会中保存自己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紧迫感。

互文性理论发展到后期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场面。以热奈特为代表的学者从结构主义路径阐释互文理论，热奈特提出的五种跨文本类型理论，它们之间并非封闭、没有交流，而是相互交叉、互相影响，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热奈特互文性理论重申作者意图的重要性，追寻文本的确定意义，注重文本解读的实用性等特点。而以德里达、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为代表的学者则从解构主义路径审视互文理论的利弊。德里达的互文性理论认为一切话语都具有互文性。互文性理论在后来保罗·德曼、希利斯·米勒的批评理论中发展地更为成熟，并被广泛运用到文学批评实践中。随后，互文性理论的发展到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萨伊斯·摩根借助《互文的空间》里根据作者在创作中出于不同目的有意和无意地借用他人文本的做法，提出文本之间的互文三法：肯定互文性、否定互文性和内在互文性。由此可见，无论是热奈特结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建构、德里达解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建构，还是摩根否定互文性理论的建构，都在某种意义上丰富和完善了早期互文理论的不足，拓宽了互文性理论研究的视野和范围。国内对热奈特结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和德里达解构主义路径下的互文性理论研究成果比较多。王瑾的《互文性》(2005)全面总结了互文理论发展的始末。陈永国的《互文性》(外国文学,2003)从渊源与影响、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以及互文革命几个层面简单地概括了互文性理论发展的始末。朱荣华的《论〈紫色〉中的“否定互文性”现象》(外国文学评论,2006)引入了摩根否定互文性理论，颠覆了传统互文性理论研究的视角，进一步完善了互文理论的正反两面内容，使国内互文性理论研究更趋合理和科学。目前学界互文性理论的研究普遍存在着研究视角比较狭窄的问题。

6 后现代文本策略下的互文性理论的建构

互文性在其自身的理论流变中彰显出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这使它能与后现代文本策略划上等号，泼费斯特指出：“互文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标志，如今，后现代主义与互文性是一对同义词。”美国文学理论家哈桑也在《后现代转

折》中将“互文性”作为后现代特征标识出来。

一些作家和学者从后现代文本策略的角度以他们的实践充实互文性理论：小说家约翰·巴思于1967年发表了著名文章《枯竭的文学》。巴思在文中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文学史的一个新阶段——“枯竭的文学”阶段，在这个阶段所有创造性动力已消耗殆尽，并且独创性仅以现存文本和传统结构的复杂游戏的形式残存下去，这些形式即：典故、引语、滑稽模仿和拼贴。巴思的短篇小说《迷失在游乐园中》就是一部互文性很强的作品。而另一位美国小说家兼批评家雷蒙德·费德曼则认为文学生产是一种持续的（游戏性）剽窃，即这是一种游戏与互文的结合，一种嬉戏性与互文的剽窃。

互文性是作为一种文本策略与后现代文学的其他特征密切关联的。乌里奇·布洛赫把这些特征总结为如下几项：1) 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了。作家不再进行原创造，他只是重组和回收前文本的材料。2) 读者的解放：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混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3) 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后现代主义文学成为无数文本的反射，文学不再是“自然之镜”，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4) 剽窃的文学：文学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或回收，它是寄生的。这一发现致使传统的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消失了。5) 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这种混合建构的效果不在于和谐，而在于冲突。6) 无限的回归：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取得了“套盒”效应：它能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

7 结语

总体来说，与传统的文学研究相比，互文性理论更强调读者与批评家的作用，同时拒绝明确那种所谓的固定不变的意义。也就是说它主张语义的流动性，更重要的是，它注重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关系，注重文本与文化的表意实践之间的关系，从而突出了文化与文学文本以及其他艺术文本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不同情况下的互文性理论对于当今的文学文本研究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仅对于拓宽当代文学批评和理论的视野有着积极作用，同时对于探索传统与创新关系研究而言，无疑也是一种新的视角。

注释

① 关于摩根的三种互文性的界定,主要参考了2006年朱荣华发表在《外国文学评论》第二期的论文《论〈紫色〉中的“否定互文性”现象》。

参考文献

- Kristeva, J. 1969. *Semiotike*. Paris Seuil.
- 1986. *In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Ltd.
- Bloom, H. 1973. *The Anxiety of Influence. A Theory of Poet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1980. *Poetry and Repress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Derrida, J. 1979. Living on: Borderlines,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In H. Bloom (ed.), *Deconstruction and Criticism*. New York: Seabury, 176—175.
- Hillis, M. J. 1982. *Fiction and Repetition*. Oxford: Blackwell.
- 艾略特, 1989,《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 巴赫金, 1998,《巴赫金全集》(钱中文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
- 陈永国, 2003,互文性,《外国文学》(1): 75—81。
- 胡宝平, 1999,论布鲁姆的诗学误读,《国外文学》(4): 21—24。
- 卡特琳娜·克拉克、迈克尔·霍奎斯特著, 2000,《米哈伊尔·巴赫金》(语冰译),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瑾, 2005,《互文性》,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王玉括, 2005,译者的身份建构,《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5): 40—46。